

怀念我的老师 - 袁方先生

刘永川

2025 年 7 月 10 日



光阴似箭，袁方老师离世已经 25 年了。而我在他指导下学习的岁月，至今也已有三、四十年，但回想起来，却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我是 1983 年秋天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80 年代的北大校园充满活力，各种社团和讲座丰富多彩，让我很快融入其中，拥有充实的学习和业余生活。开学不久，我见了袁方老师几次。那时，他已年逾六十，除了担任系主任，还担任许多社会兼职职务。当时我曾想，也许袁先生只是我的挂名导师，我可以继续发挥自己较强的自学能力，并借助北大的自由学术氛围，随心探索。然而没想到，后来与袁方老师的接触日益频繁，讨论也愈发深入，这不仅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发展轨迹，还让我收获了一段特别而珍贵的学习历程。

大约在 1983 年底左右，我曾到袁老师的办公室，与他聊到人口研究时，他突然问我是否了解钱学森和宋健的人口预测模型。我回答说知道一些，并表示建立这种模型并不困难。他们的模型以微分方程为基础，结合统计学与控制论，不断提高预测能力。我们不仅有各种数据，还有北大的计算机中心，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模型，甚至可能得到更好的预测结果。当时，袁老师似乎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觉得我有些不够谦逊，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便尴尬地离开了。但那之后，袁老师依然热情地与我探讨抽样、问卷调查等问题。从那时起，我觉得他并没有在意我的“不谦虚”，有时我还会主动与他讨论一些社会学方法的问题，比如数理社会学的发展、基于时序数据的社会动态分析等，似乎他也乐在其中。有些特别的课题，我还查找了英文资料并翻译成中文作参考。将翻译稿交给袁老师后，他常会把它们交到系资料室打印并分发给其他学者。有些内容甚至被我寄到外部刊物发表。

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实证社会学在海外已迅速发展，定量研究不仅兴起，而且逐渐制度化，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与资金支持。尤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和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都获得了充足的经费，收集了大量数据，对政策分析与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的数据分析方法，如回归模型、结构方程、事件历史分析等，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然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完全是一片空白。面对这种状况，把社会学视为自己孩子、视为毕生追求的袁老师们，确实非常焦急。他们那种强烈的紧迫感，以及不分昼夜投入推动社会学重建的精神，相信当时深深感染了我们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

曾有老师说，我报考北大时数学成绩特别优秀(100分、满分)，因此袁老师十分器重，便将我往研究方法方向培养。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迫切希望追赶国外社会学发展的需求所致。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社会学停滞了二十年，出现了“中年断代”的问题。记得系里许多课程，尤其是研究方法类课程，几乎都是由外校的兼职教师或短期访问的美国学者承担的。凡是与统计和方法相关的课程和讲座，我几乎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参与。

但有一次，袁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认真地批评了我一番，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不断辩解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细聊之后才明白，原来袁老师曾向一位老师特别推荐了我，那位老师却误以为我是助教，按照助教的标准来要求我，因此觉得我不够称职。他甚至认为，我有时会与其他学生一起提出“刁钻”问题，似乎是在刻意挑战老师的权威。弄清了全部情况后，我连连解释，并迅速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后来，我真的成为了一位美国来访教授的正式助教，并协助他完整地上了一学期的课程。

显然，袁老师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让我完成并学好每一门定量分析和统计课程，而是希望我以助教的身份深度参与，最终能够独立承担这类课程的教学工作。

北大社会学系的人丁兴旺，恰好是从1983年，也就是我入学的那一年开始的。相较于前两年只有寥寥数位研究生，我们83级虽也只有5名社会学系研究生，但当时还代培了来自社科院的4名研究生和政法大学的7名研究生，与我们一起上课。同年，社会学系还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共30人。这样算下来，1983年共有46位新生加入社会学系，可谓热闹。

不久之后，系外学生还成立了一个“北大社会学社”，由外文系的杨捷负责，约有十几位骨干成员常常聚会讨论。袁老师派我去辅导杨捷他们的学习与实践，这使我与杨捷结下了多年的交情，也让我结识了一批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外系学生。和许多老一辈社会学家一样，袁老师非常注重社会学的实践与调查研究，多次提醒我，模型和计算必须以实地调查和数

据为基础。恰好那时我读到许多国外关于问卷调查的资料，便拿给袁老师看，也让他感受到我跃跃欲试的热情。

当时，袁老师还在北京市社会学协会兼职领导，手头正好有一个关于离休老干部的调研项目需要推进，便把任务交给我负责。我欣然接受后，立刻找到杨捷帮忙召集社员，参与问卷调查的访谈和数据收集。由于社会学社的人手不足，我又邀请了几位 83 级本科生协助。他们曾修读过一些社会学课程，又都是北京本地人，大家配合默契，使得我们在北京房山的问卷调查进展非常顺利。

从此，我和 83 级本科生逐渐熟络起来。尽管当时我也不过 24、25 岁，有几位本科生却总是叫我“老刘”，让我一开始觉得有些难以管理。但他们做调查时灵活高效，执行力强，最终我们合作愉快，配合得非常默契。

北大社会学社和其他社团曾邀请我多次做社会学介绍讲座。可能因为我在理论介绍上不够生动，但在社会学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方面讲得通俗易懂，“数据—分析—决策”三段论一下子便被许多人理解和接受。有一阵子，北大许多社团和学生会都在开展问卷调查，北大团委、党委等机构也曾邀请我们协助进行相关调研。

当时，陈科文和周拥平也做过几次问卷调查，设计得非常系统，并撰写了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成为当时很有代表性的参考案例。正因如此，北大不少人甚至一度以为“社会学就是做问卷调查的学科”。

不过，我们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提供服务的高潮，还是在林彬把国家体制改革研究的项目引入后出现的。恰好那时，我们已经有了经验、知识和团队的优势，而国家体制改革机构不仅有充足的经费，还能开具介绍信，帮助我们在各地顺利开展工作。这样结合起来，使我们得以顺利进行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

第一个项目是针对物价改革社会反应的调查，由我和林彬共同协调完成，效果非常理想。此后，我们顺势展开了一系列类似的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积累了宝贵的实证研究经验。

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和资源，袁老师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由此，我还获得了使用北大计算中心那台“衣柜”大小的计算机的机会，并通过打卡程序调用 SPSS 进行数据分析。我记得，当时是和林彬、陈科文一起合作，逐步摸索并掌握了 SPSS 和 SAS 的操作方法，最终成功跑通了运算。从那以后，我被认为是系里的 SPSS 专家之一，常常为同学们和老师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

后来，系里邀请外教为 83 级本科生讲授研究方法课程，其中 SPSS 部分的讲授与计算机实习都交给我负责。此外，我还曾辅导过一些 85 级研究生学习 SPSS，帮助他们完成数据分析任务。

当年，袁老师在带领重建北大社会学系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北京社会学会及相关系统的重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实际上是在重建社会学研究的“生态系统”。他与国内外众多社会学家保持密切联系，几乎每天都在忙碌地工作，事务繁多，几乎无暇顾及其他。相信他有时也真心希望我们这些研究生能分担一些任务。

不过，起初我对行政事务和人员联系工作有些抗拒。当时，我虽然参与了北大研究生会和一些社团的活动，但多是浅尝辄止。袁老师察觉到了我的态度，几次尝试与我交谈，讲述其中的道理，虽然未能完全说服我，但我也不好拒绝，于是便帮他承担了不少联系和传达的工作。特别是与一些外国教授、国内的社会学协会、北大社会学社以及系内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联络，都有我参与其中。

后来，美国的林楠教授来系里讲授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我才逐渐理解这种“联系”对于一个组织的重要性与价值，于是慢慢进入角色，更加认真负责地协助袁老师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个年代，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老一辈学者们都在争分夺秒地投入研究与建设。袁老师介绍我结识的学者，大多都非常平易近人，与我毫无保留地交流，给予了许多鼓励，让我受益匪浅。当然，也有几位学者总是提醒我：方法、数据、分析计算都是工具，万不可过于依赖和重视。多数时候，我只是听一听，笑笑了事，偶尔也会忍不住为方法“辩护”，强调我们正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首要任务是重建基础，尽快追赶国际发展水平。

有一次，我可能被一位学者的话激怒，当场脱口而出反驳道：“毛主席从井冈山开始，也是非常重视并不断受益于社会调查呀！”这句话让对方脸色大变，我只好赶紧离开现场。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可能有些过于强调调查、数据和分析运算，也因此有人向袁老师“告状”，说我态度过激、方法论倾向过重。但袁老师从未因此责怪过我，系里负责行政工作的王书记、游老师、华老师也始终对我宽容体谅。

随着在外面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陆续有朋友开始询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他们所在的单位工作。出于对朋友们好意的尊重，我也都认真考虑过。或许这些信息传到了系里，袁老师有一次郑重地为我提出了毕业后的去向建议。他认为，我并不适合做政策研究，因为我不喜欢写文章，也对政治和人际关系不够敏感；相比之下，我更适合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

不久，袁老师、游老师和一位行政工作人员一起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系里建议我出国深造，准备推荐我申请美国的富布莱特奖学金计划。当时，富布莱特奖学金刚与中国谈妥，开始资助中国学生出国，但每位学生只提供一年的资助，以便惠及更多人。那时，北大已有许多学生准备出国，托福和 GRE 补习非常热闹，但我并没有加入其中，而是将精

力投入到社会联系和研究项目上。为了推动这些工作，我还成立了一个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正在建设数据库、社会指标体系和算法模型集合，并逐渐受到关注，发展势头正盛。

因此，我对出国深造一事有些犹豫，并坦诚告诉老师们，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英文，担心辜负他们的期望。然而，未等我解释完，袁老师他们就说：“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马上开始准备吧，我们也立即向学校报批。”几乎不给我多加思考的机会，我的发展方向就这样被迅速推向了新的轨道。

被系里和学校推荐后，若要真正被富布莱特计划录取，还需要通过一次笔试和一次在美国大使馆内进行的英文面试。我的快速学习和应对考试的能力一向不错，再加上被推荐后的录取比例较高，我便顺利通过了考试，最终被富布莱特计划录取。

获得奖学金后，富布莱特基金会立即催促我准备托福和 GRE 考试，并整理申请入学所需的各种材料，包括成绩单和推荐信。这时我才真正了解到，申请去美国读研究生的流程如此繁琐，申请入学和申请奖学金竟然是两回事。虽然开始有些担心，但似乎也已没有退路，我只好在袁老师的帮助下，放下所有社会工作和研究项目，专心投入准备。

然而，硕士论文仍需完成，部分研究工作也需要交接和安排，忙得让我焦头烂额。幸好，当时常与我们一起活动的英国留学生丹尼尔给予了很大帮助，协助我顺利完成了推荐信和个人陈述的撰写。

由于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未接触英语，留给复习的时间也相当有限。尽管我非常努力，托福和 GRE 的语言部分成绩并不理想，仅勉强超过录取基本标准；但 GRE 的数学部分成绩非常优异，在社会科学考生中表现尤为突出。

出国申请读研究生需要自己选择学校，富布莱特基金会为此提供了一大批美国大学的资料供参考，主要包括各大学的总体排名和按学科细分的专业排名。为此，我特地去向袁老师请教。他表示，当然要申请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以及几所与他和系里有良好关系、熟悉的教授所在的大学。

我告诉他，富布莱特基金会只承担三所大学的申请费用，如果申请超过三所，就需要自己负担。当时，我作为一个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实在无力支付额外的费用，因此计划只申请三所大学。密歇根大学或威斯康星大学二者选一，这也是我本来就倾向的选择。除此之外，我打算申请匹兹堡大学，因为他们主编《数理社会学杂志》，并且当地几所大学有一些团队致力于将社会科学和哲学命题数学化、计算程序化的研究。袁老师显然对匹兹堡大学兴趣不大，但见我说得兴致勃勃，也就没有强烈反对。

第三所，我计划申请斯坦福大学。记得当时袁老师似乎对斯坦福大学也不太感兴趣，我连忙解释，斯坦福在创新领域处于前沿，尤其在计算工具和模型研发方面领先；SPSS 也是

最初由斯坦福研发的，那时斯坦福社会学系也有几位教授专注于社会动态模型的研究，学术氛围非常适合我。听完我的解释后，袁老师还是坚持认为，应将密歇根大学或威斯康星大学作为申请重点。

我当时也能体会到，他之所以建议我优先申请那几所与他和系里关系密切的大学，是希望我申请成功率更高；另一方面，他显然也希望将北大社会学系建设成类似于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那样有雄厚定量研究、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机构。

很快，斯坦福大学向我发出了录取通知。富布莱特基金会随即建议我立即接受，因为那一年，美国大学排名中斯坦福位列第一，他们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么棒的结果，你还犹豫什么呢！”就这样，我结束了整个繁琐的美国研究生申请过程，最终确定赴斯坦福大学深造。

我将结果告诉袁老师后，他显然有些失望。我则安慰他说，斯坦福还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那里，我更方便为他和系里联系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果然，1986年秋我到达斯坦福后，我们系及相关领域的许多人陆续来访，与我交流切磋。记得林彬、杨善华、陈科文、阎焱、彭玉生等人都曾到访。

尤其是1987年，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后，接待与交流几乎成为我学习之外的首要任务。北大丁石孙校长曾率团访问斯坦福，中国社科院一位副院长也到访过。当时，我用800美元买了一辆深蓝色福特牌旧车，专门用于接送来访嘉宾，乐此不疲。不久前，李国庆还提起，他记得曾坐过我那辆车。后来，王汉生陪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代表团来访时，因为那段时间往来斯坦福的学者络绎不绝，我们已正式成立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这个论坛由学生会牵头，斯坦福的同学周雪光、黄晶生、殷鼎等共同协调，邀请国内外众多著名学者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及社会发展的相关课题。

与斯坦福校内学者的交流也非常丰富。包括与诺贝尔奖得主、知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探讨中国改革，他当时正与中国社科院合作，并与中国领导人有交流；还与社会学系著名的现代化研究学者英克尔斯教授深入讨论现代化问题。英克尔斯曾赴中国讲学，并与南开大学开展合作，这些背景曾使我们的对话格外深入而生动。

富布莱特基金会只提供一年的资助，之后我便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助教和助研。斯坦福社会学系有三门研究生必修的定量方法课程，我都担任过助教；同时，我还为几位教授做助研工作，主要负责数据处理、利用SPSS进行建模与分析。

有人曾打趣说，那时常常看到我拎着“脸盆”大小的磁盘，在教授办公室和计算机中心之间来回奔忙。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专业技能，也让我深刻体验到科研工作的辛苦与乐趣。

当我将这些工作细节告诉袁老师时，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似乎恨不得我能尽快完成学业，早日回到北大，开展同样的工作。

1988年，国家教委挑选并组织了来自欧美、日本等地的49位留学生回国参观，我也有幸参与其中，被安排赴南方进行考察。从北京出发，经石家庄到武汉，再南下至深圳、珠海、东莞、江门等地，参观了许多加工区的工厂，并参加了多场座谈会。

我还记得，早在1984年，为了体改委的物价改革社会调查，我与吴曲辉和几位83级本科生，联合浙江大学的余炳辉老师及其学生，曾两次前往温州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之余，我们参观了温州的小纽扣市场和电器市场，当时被誉为东亚最大的纽扣专业市场，曾让我深感震撼。那时，费老等正研究温州的发展模式。

这次能够前往广东参观，我正好萌生了将浙江温州模式与广东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在行前经过北京时，我专程去见了袁老师。他对我的行程非常高兴，特别叮嘱我把此次参观考察当作一次高端的调查访问，并且非常认可我提出的“浙江—广东比较”的研究视角。这次，我还在北京见到了雷老。

在广东参观期间，我最初将重点放在东莞，然而最终却被深圳的发展活力所深深吸引。这或许与我曾学习过机械制造有关，使我觉得当时东莞的制造业仍偏低端，而深圳则展现出更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面貌。在深圳，我们参观了许多工厂和企业，并与深圳市副市长及多位政府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她们还询问我何时毕业，以及是否有兴趣前往深圳工作。

1989年，斯坦福社会学系的杜马（Tuma）教授来中国讲学，我也借此机会回国了一趟，帮她的讲座做翻译，还参加了不少交流活动。我特意去见了袁老师，不仅在办公室聊，还去他家里坐了坐，和费老也见了面，聊了很多想法和感受。袁老师还让我去他带的研究生班里做了一场讲座，和大家轻松地聊了很多。

在北京的时候，何凡兴在人民大学帮我安排了一个住处。而我在斯坦福的一位好友的太太（她也是北大毕业生，当时在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好要出差，也把她在北大的房子借给我用，这让我特别感激。就这样，我在北京从4月10日一直住到5月27日离开，期间一直忙着和老师、同学们见面交流。

那时，社会学系早已今非昔比，已经有好几届本科生和硕士生毕业了。我去旁听了周拥平的博士论文答辩，看到王汉生那边正在带着团队做不少调查项目。其他同学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有的在教学，有的在搞研究。看着这一切，我突然觉得自己得加快脚步了，心里特别强烈地感到：是时候抓紧完成学业，早点回来一起干点实事。

1993 年，我给袁老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完成了学业，拿到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和统计计算硕士学位。当时，我正在斯坦福的亚太研究中心做医疗卫生领域的跨国比较定量研究。袁老师很快回了信，特别高兴地说：“系里欢迎你随时回来工作！”

收到这封回信，我心里暖和。但后来，因为和一些单位的联系、协商都没有谈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那段时间，正值中国“下海”经商的热潮，很多朋友都纷纷投身商界，赚了不少钱，这对我也带来很大的冲击。

不过，那时我正被一些方法深深吸引，比如决策树、贝叶斯因果网络、统计学习等等，这些在当时并不被太多人重视，却在悄悄地快速发展。我坚持下来，在从事各种实践项目的同时，继续钻研这些新方法。后来，这些技术逐渐汇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浪潮，我也顺势投身到了这场激动人心、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篇章中。

2019 年 5 月，我受邀在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的年会上做了一场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主题演讲。那时，我在 IBM 担任大数据分析服务的首席数据科学家。因为很多人都好奇，问我数据和 AI 工作与我在北大社会学时期的学习到底有什么联系，这次我正好借机会好好解释了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现在做的数据科学工作，和当年在北大学习社会学时在核心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社会学和数据科学都像是一种“万金油”，可以跨领域、跨场景地应用。在社会学里，有法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等等；而数据科学里，也有法律数据、家庭数据、经济数据、政治数据等各式各样的应用场景。

我在北大的时候，就一直做数据收集和分析，那时候用的是 SPSS；现在也还是用 SPSS，只是更加成熟、更强大了。2009 年，SPSS 被 IBM 收购，我后来还参与过把 SPSS 整合到 IBM 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一些工作。想想看，这一路走来，虽然时代和技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种探索数据背后社会规律的热情，以及对数据驱动方法论的热爱和坚持，其实一直没变。

我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也常常会碰到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每次聊起北大的时光，总是让我感慨万千。

有一次，一位朋友在闲聊中笑着问我：“那时候你算是袁方老师的学生、助教、助研，还是助理呢？”

我笑着回答：“都不是，或者说都不完全是，可能更像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徒弟’吧。”

徒弟不仅跑前跑后做各种事情，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经历中去学习，学习知识，学习如何做人，学习如何做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学习如何在时代的风浪里不断成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最终成为那个能够引领后辈、但又不被风浪击垮的“老师”。

时间在飞逝，科技在飞速发展。名利终会消散，风波也终会远去，唯有对学科发展的热爱，师生和同学之间那种不计得失的关爱与扶持，以及为重建事业而付出的那份创业精神，才会成为真正永不消逝、长久闪光的力量。

我在北大的学习一直有袁老师的悉心指导；后来，在斯坦福的学习中，也始终离不开他不断的建议与启发。加起来，我和袁老师从 1983 年到 1993 年，有整整十年的交往，这十年里，我不断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

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十年。借着北大社会学系纪念活动的契机，我把这段回忆写了下来，想以此特别纪念我的老师——袁方先生，纪念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纪念那充满理想与热情的 80 年代。